

为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挥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论述和相关指示精神,金秋10月,来自全国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榆林学院,共同探讨陕北(榆林)红色文化的发掘、保护、传承和应用。本报将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整理刊发,以促进红色文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党员干部党性教育、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运用红色文化资源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效果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现代历史研究所 马金铃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形成,能够被开发、利用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的总和。红色文化蕴含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弥足珍贵的教学资源。

西安交通大学近现代历史研究所成立于2006年,主要负责全校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二级学科的建设工作。近年来,我所以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为核心,以专业梯队建设为重点,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发展目标,结合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形成了以教材为准绳,以史实为依据,结合社会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开展课程教学的教学模式,推动了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变化了的教学对象,真正成为大学生想听、真信的精品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团队进行了许多探索。

陕西省作为一个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省份,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一笔宝贵且丰富的红色资源。充分挖掘这一宝贵资源并将其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紧密联系起来,利用红色文化启迪青年学生的心灵,激发他们对“四个选择”的高度认同,使“听党指挥、跟党走”能够注入师生思想深处,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精神进课堂、进教案、进头脑的目的。这既是继承传统红色文化的需要,也是加强和建设具有交大特色的“纲要”课教学体系的创新性途径。

一、以红色资源研究为抓手,凝聚学术研究方向

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形成,能够被开发、利用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的总和。红色文化蕴含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将陕西红色资源研究作为凝聚我所研究力量的重要抓手,以研究促教学,已初见成效。

科学研究是教学的支柱。提高思政教学质量,首先要将科研方向朝马克思主义理论集聚。陕西省作为重要的战略腹地,承担着历届政权重要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的建设任务。“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是西安交大的办学定位。我们依据

学校办学定位,立足陕西,深挖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以西北革命研究带动学科建设。近10年来,陕西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已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借此良好学术生态环境,将学术研究与课程建设相结合,抓住机遇,推动教学科研上新台阶。

1. 成立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

2017年底,在经过多方论证的基础上,以近现代历史研究所为依托,成立“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这是全国高校首家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2020年7月正式进驻创新港马克思主义与治国理政研究中心。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以工作坊的形式,每年根据需要对陕西及西北红色文化进行不定期的学术研讨活动;二是以平台组织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

研究中心以什么为主攻方向?这是中心起步阶段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有了好的起步,才能迅速发展。我中心请省内党史专家进行论证,对研究中心的发展方向、学术定位及研究课题做出具体的指导。在首届工作坊上,梁星亮教授作了题为《西北革命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第一,研究空间地域范围是“大西北”还是“小西北”的问题。第二,西北革命史研究时间范畴的上限与下限问题。第三,西北革命史中的革命类型问题。姚文琦研究员作了题为《西北革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三个亟待研究的课题:第一,早期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研究。第二,冯玉祥、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的研究。第三,红二十五军的研究。省内资深党史专家的分析、建议和引导为中心研究工作的起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学院的著名学者亦关心“中心”的成长。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教育部思政教指委研究生分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宏波教授专门来中心座谈,对我中心研究方法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理论导向与现实关照的历史研究”方法,瞄准国家需要,形成西交大特色的党史研究。

2. 整合团队力量,推出红色文化研究成果

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成立后,我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很快就开展合作攻关工作。2018年《西安红色地图》寻找撰写作者,我们吸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交通大学实践教学基地)的成员参与,承担了这项任务。此书以西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为中心,讲述了西安地区13处著名的红色遗址及其相关革命故事,通过梳理西安地区红色文化的发展过程,挖掘西安地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以故事化的

写作方式,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西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革命人物经历。通过这个革命传统教育读本,教师们不仅为“纲要”课积淀了活生生的教学案例,也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诸多课题。

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上一年底,我中心就筹划搞一个集体协作的科研项目,在学院领导的积极支持鼓励下,团队成员几番讨论后,决定以五四运动与西北为题展开研究,撰写了8篇论文:《五四时期旅陕籍青年主办进步刊物》《五四时期西北革命“播火者”魏野畴》《陕西籍同盟会成员与五四运动》《陕西靖国军与五四运动》《五四时期的甘肃报刊》《五四运动时期陕西的舆论宣传》《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和《五四运动与中共甘肃特支的成立》。文章经过修改和反复压缩后,于2月12日,以《五四运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发表。文章引起了省上领导的注意,对这种集体合作快出成果的方式予以肯定。

3. 培养研究生方向明确

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成立后,决定把研究生选题确定在陕西红色文化的研究方向上以特色研究带动人才培养。

随着教育部对全国重点马院建设的加强,我院研究生数量迅速增加,研究队伍也壮大起来。低年级研究生在参与导师研究项目时,主要负责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通过接触大量的史料,以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二年级开题时就不会茫然了。一旦开题成功,导师就指导学生看陕西省的相关县志,看回忆录拓展思路,筑牢史料基础。

学生在做论文时与导师的交流,搜集到的资料,对导师的研究也有很大启发和帮助。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二、用小故事讲大道理,提高“纲要”课教学实效性

如何上好思政课,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是多年来我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课题,如何在教学中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抬头率。用讲故事的办法吸引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用小故事讲大道理,是近年来我们探索的一种教学手段,每章节的重要理论和知识点通过一个小的故事切入,通过活生生的的人和事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讲清讲透,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触摸历史。利用陕西地方历史资源,拓展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动手动脑,“触摸历史”过程中研史明道。

陕西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省份。陕西能

够成为中国革命“两点一存”的区域,历史渊源深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选取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作为大家共同使用的教学案例。

将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引入课堂教学和慕课、微课教学之后,必然要求《纲要》课的考核方式实现同步创新。我团队不再一味固守传统的考核方式,而是积极探索学生在学习、领会红色文化资源后对于“两个了解”、“四个选择”认知程度的考核途径,比如拍摄微电影、撰写地方红色资源调研报告、提交红色观影后感等等。

通过努力,我团队2018年获校级课题“陕西红色资源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实践与探索研究”,“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获得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三等奖。

三、开展校地合作,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深刻阐释了“西迁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并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西迁,是当代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服务国家发展壮举。总书记西交大之行,也是对交大人的高度肯定。立足陕西,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中心成立后,密切与陕西省党史研究室合作参与一些重大的党史项目工作。2018年,我所两位教师参与撰写《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三卷)工作。省党史室高新任主任亲自抓这项要求高、难度大、工期长的工作。

2020年7月与陕西省委党史一处合作,以历史所师生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20万)为基础,成功申报“中央引导资金项目”(经费30万)。历史所师生承担了大纲拟定、内容撰写及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并选择部分内容作为毕业论文选题。

2020年8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陕西红色文化教育读本》(中小学)申报省教委项目。由于我们前期曾撰写《西安红色地图》一书,三天内拿出了申报样稿,使申报工作顺利推进。

通过对陕西红色资源的挖掘和研究,我们积累了一些鲜活的历史资料。发挥“党史育人”功能,在校内外党员干部培训班和党课上,我团队的教师授课颇受欢迎,连续多年学生评教达到90分以上,影响力不断提升。

记忆视角下红色场馆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提升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于明艳、伏志强

记忆与场所的结合诞生了“记忆术”,西塞罗、奥古斯丁、多明我会、弗朗西斯·耶次等人都对场所/位置对记忆的促进作用有过论述;而皮埃尔·诺拉将两个词结合,提出“记忆之场”,并使之具有比该词原意更广泛的意义,“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作为化工色历史产物,需要被保护好和利用好的红色场馆在这三个方面就是共存的:占据一定地理位置的、被建筑出的实在空间,发挥教育、塑造和传承价值观的功能,作为历史事件、荣誉和铭记的象征。这三方面的结合使得红色场馆在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方面作用突出。具体表现为:红色场馆使得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可视,易于记忆和思考;红色场馆扩展了教学场域、产生新的知识;参观红色场馆及此过程中产生的思考与交流,这些活动本身唤起高校学生的记忆责任,实现对高思政内容的认同与生成。

一、红色场馆使得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可视,易于记忆和思考

高校思政课主要以文本为媒介,如教科书,高校学生通过想象,构建学习内容;而红色场馆则通过空间、物件、灯光、声音等多维、多感知呈现思政内容,使其可视、易于记忆和思考。李大钊同志说:“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存在,自从他们消亡的那一俄顷,吾人便已发见之于吾人想象中,保藏之于吾人记忆中;他们便已生存于吾人记忆中,想象中了。”红色历史上的人或事一旦过去,便属于过去,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之中。而记忆是鲜活的,即总有由现在的我们来承载;但记忆的发生环境已不在,记忆的环境也已发生变化。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已远去,“小米加步枪”的事件不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物质条件也已较少存在。这种环境的不同与断裂,发生事件的远去,使得当下自发的红色记忆难以发生;正如,就需要建筑和构建具有功能与象征意义的实在性红色场馆,以便凝结与安放记忆。与此同时,作为过去的人或事,是作为历史知识、以文字文本的形式出现在高校思政课的课堂上,以教科书的典型形式存在。在文本中,红色历史通过历史话语间接地被提及;高校思政课师生借由文字对事件实现精确记忆、重构过去,通过想象力完成

此工作。通过记忆与想象,红色人物、红色事件被感知到,但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有某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就是说每个受教育个体,“在所有的事情中,他可能记住的,只有那些与自己的这些认识保持合理程度的相关性和协调性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对红色历史的记忆与想象具有差异性。而红色场馆则可以通过可视化高校思政课内容缩小上述产生的个体红色记忆的差异性,实现知识的记忆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深情地说:“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场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考。”“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红色场馆展示、展览、纪念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图片、文字、物件、影像、雕像等,并且按照一定顺序(多以事件为主题,时间为线索)布设。从记忆技巧,即“记忆术”角度讲,将作为知识表征的物件、图像等摆放在一定的位置,利于知识的记忆与掌握。14世纪初期,多明我会指出,有四件事能帮助人们得到良好的记忆:第一件是要以确定的顺序安排要记忆的事物;第二件是要全神贯注;第三件是要将它们用不同寻常的符号加以标示;第四件是经常重复并加以思考。高校思政课内容在红色场馆中通过形象的物品标示,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在空间中排列、展示,吸引来参观的高校学生的注意力;集体活动中的交流又使思考即时发生,而且红色场馆参观的重复性也时有发生。对“记忆术”的运用,红色场馆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具体呈现,成为凝结与安放记忆的堡垒,大大提升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传授和掌握。

二、红色场馆扩展了教学场域、产生新的知识

当今时代,知识的生产者变得不再唯一,而是每个个体都成为连接点。红色场馆使得教室里读到的文本变得具象与可视化,是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的扩展。实际上是以视觉感知占主导地位向空间感知凸显的转变,增强了理论的彻底说服力,激发高校学生自身的力量,并与理论内容、红色历史进行深入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积极互动;教室同红色场馆的教育界限变得模糊,红色场馆成为新的“教室”,生产新的知识。新“教室”之所以能产生新知识得益于:第一,其为社会交往的空间,更多的交流与讨论,即重于坐在教室中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红色场馆的课堂是开

放的,交流是随时、及时和共时的,既不受固定授课时间的限制,也摆脱了课堂秩序的束缚,学生以更主动的状态参与到思政课教学中。第二,红色场馆提供了基于数字时代得以实现的、翔实、壮大的历史数据库资料,借助虚拟技术实现历史虚拟环境与情境。沉浸式的体验使得主体在历史画卷中行走,获得具有更多细节与情感的体验。知识传播由单向传播变成互动联结的生产,扩展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互动循环的学习使得教学效果得以保障。

参观红色场馆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呈现,新知识在这一开阔的教学场域中形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此处具体为许多个人在红色场馆中进行的言语与交流活动。马克思用实践的观点,把问题放在关系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共同参观红色场馆的社会关系中,人(自我)、人与人之间交往,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高校思政课内容在师生那里变得稳定、持久、外化成为行为,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具体表现为,参观红色场馆的人员,可以是以高校学生个体形式,也可能是以团体的形式进行,这样,在同一时段参观场馆的主体之间,就有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关系存在。但无论熟悉还是陌生,都由于共同空间、共同话题而变得流畅沟通与交往:

与解说员的沟通,与观看同一展品的其他人员的感想交流、恰好听到旁边团队关于眼前红色人物的轶事分享,等等。这种社会交往可以很好地实现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换,即个体从思政课中获得的关于红色历史的认知与情感唤起,在与其他(非自身、非亲)人或放松或质疑或愉悦的交往、沟通中,形成着新的社会关系,同时,将基于个体学习与想象的知识,变成与社会其他成员(一个更大的群体)相对一致的、专业、凝练、稳定的知识。这种知识既可以是哈布瓦赫意义上的集体记忆,扬·阿斯曼意义上的文化记忆;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此处为参观红色场馆)的社会交往由多个发言者共同生发出对高校思政课中某一内容的新领悟。

三、参观红色场馆的活动唤起高校学生的记忆责任

参观红色场馆多以集体组织的形式进行:“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人们的身体聚集到同一个地点,开始了仪式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参观红色场馆属于仪式。此仪式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抵抗对于作为历史资源的、发生的事件远去和逝去的遗忘,另一方面是个体确定其群体成员身份、获得认同感的途径。仪式重复利用巩固记忆。记忆是具身性的,所以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记忆则是个性化的,具有主观性和心理性,被视为一种责任来经历。高校学生在参观红色场馆过程中,接触到在教室里读到的文字中未曾“见过”的东西——不再存在的地方、从未见过的红色人物、出生之前已经发生的红色事件等。红色场馆使过去的地方、人物、事件有意义而且真实可信,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传承价值观的教育功能。参观者感受与过去的红色历史靠近了。在“英雄”、“伟业”的面前,高校学生与过去、与教育、与文化之间“交互”,感受到前人的伟大和传承记忆的责任。

记忆的责任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记忆的具身性、鲜活性的,使得记忆具有属我性,记忆的再生建立在个人与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上。高校学生参观红色场馆时是在书中穿梭,在行走与站立的交替运动中,对红色场馆空间中呈现的物品进行观察、阅读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高校思政课中不曾遇到过的因素开始影响主体的学习,比如光、色彩、声音、人工或机器解说、口头交流与争辩等。这种主体所面临的“环境语境”是教室学习行为所不具备的,有助于实现学生在思政课中实现自我回溯,实现对思政课内容的认知、省思和认同。主体认同的实现与记忆责任、红色场馆的功能和多感知实践密不可分。“过去从未真正过去,它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部分”。每个学生在场馆中对物品的利用与互动以及参观红色场馆活动本身,是其与同伴、集体连接起来的纽带;是个体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他们当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红色场馆中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主体完成自身和集体认同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被记住,并逐渐外化于行。